

“哎呀,听听这小孩子”——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推介与翻译

杨焄

由于周作人身体力行的揄扬鼓吹,安徒生逐渐为更多人所了解。绝大部分译本都像周作人所期盼的那样使用白话,可惜尚未能娴熟自如。为了不至于让读者对外来童话产生过多隔膜,有的译者还做了一些归化改造。依据不同读者的实际需求,有些译本还做过相应的删改。

丹麦作家安徒生毕生创作了 160 多篇童话,自晚清民国之际逐渐传入中国,引发了读者持续不衰的热情。个别作品如《皇帝的新衣》,更是由于诸多机缘,激起了许多人的勃勃兴致,不断地进行推介、翻译、摹仿、新编、探源和比较。今人对此虽然稍有论列,但或辗转承袭而不无讹谬,或语焉不详而多有阙略。仔细钩沉排比相关史料,不仅能够藉此考索晚近以来文学观念的递嬗演进以及学术风气的蜕变流转,更能引导我们深入窥探在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心态。

最先向国人介绍安徒生的是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孙毓修,他从 1909 年起主编《童话》丛书,第一集内就包括《海公主》(即《海的女儿》)、《小铅兵》(即《坚定的锡兵》)等安徒生作品。他还陆续发表评论,频频述及其人其作。如在《读欧美名家小说札记》(载 1909 年《东方杂志》第六年第一期)中介绍道,“安徒生 Anderson 者,丹麦人也,以说平话闻于时,著 Fairy Tales。人人诵习,至今不废”,“恒喜以诙谐之辞,强小儿而语之,使闻者不懈而几于道。其感人速,虽良教育者不能及也”;在《神怪小说》(载 1913 年《小说月报》第四卷第四号)中则将他誉为“丹麦之大文学家,亦神怪小说之大家也”,“其脑筋中贮满神仙鬼怪,呼之欲出,是诚别擅奇才者也”;随后又在《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载 1913 年《小说月报》第四卷第六号)里进一步指出,“安徒生之书,时而花妖木魅,时而天魔山魃”,“当其闭置一室,凝神静思之顷,不啻变其身于神怪”。虽然并未言及《皇帝的新衣》,也时有牵强比附,但这些意见还是成为后人评述时的重要参照。

紧随其后,周作人发表《童话略论》(载 1913 年《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八册),尤为强调:“著作童话,

其事甚难,非熟通儿童心理者不能试,非自具儿童心理者不能善也。今欧土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 Anderson 为最工,即由其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故能如此。”尽管未暇详加论说,可敬慕之情已溢于言表。只是或许受到绍兴方言的影响,将“Anderson”译作“安兑尔然”,不免让后来的读者略感陌生。他稍后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载 1913 年《叻社丛刊》第一期)中有更为翔实的评议,在胪列作品时特别提到了《皇帝的新衣》:“言皇帝好衣,有二狙佞言能织美锦,举世无匹,唯下愚之人或不称其职者视之则不能见。帝厚赏之,使制衣。二人张空机作织状,使者往视,见机上无物,而不敢言,唯返报盛称其美。帝亲临检,亦默而退。及袞衣已成,二人排帝使裸,加以虚空之衣。皇帝乃从百官,警蹕而出。观者夹道,见帝裸行,咸莫敢言。安兑尔然于此,深刻趋时好而徇世论者。”鲁迅在当时的日记中曾有记录:“又得二弟信,附安兑尔然巨言二篇。”(《壬子日记》1912 年 10 月 12 日,《鲁迅全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可知周作人正尝试翻译安徒生童话,并和兄长有过交流切磋。此处虽然只是撮述概要,但已经粗具始末,一些特定译名如“狙佞”,也和他数年后正式发表的译文一致。鲁迅对此看来也很有兴趣,日后在杂文里还涉笔成趣地提到过“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论补》,收入《花边文学》)。

偏爱安徒生的鲁迅、周作人兄弟,对相关评论也有所关注。数年后,周瘦鹃将编译的英文小说修订汇编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中华书局,1917 年),其中有安徒生(周氏译作“盎特逊”)的一篇《断坟残碣》。正文前另有《盎特逊小传》,传末总结说:“综其生平著述,以神怪及寓言小说为多,而意中皆有寄托,非徒作也。有



周作人《童话略论》

《丑鸭》‘The Ugly Duckling’ (此篇夫子自道)、《锡兵》‘The Tin Soldier’、《皇帝之新衣》‘The Emperor’s New Clothes’、《火绒箱》‘The Tinder Box’ 诸篇,篇幅虽短,寓意却深,其状物写生,绝富兴趣,欧美儿童金好之。”“神怪”之论无疑承袭自孙毓修,但已明确将《皇帝的新衣》视为安徒生的代表作,称道其言近旨远而妙趣横生的特色。《丛刊》出版不久就引起早年编译过《域外小说集》的周氏兄弟的注意,为此特意撰写评论(载 1917 年 11 月 30 日《教育公报》第四年第十五期,原无署名;后拟题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收入《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尤其表彰此书“每一篇署作者名氏,并附小像略

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对那段针对安徒生的评介应该也极为认同。——附带提一下,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1953 年)中回忆,鲁迅看到《丛刊》之后,“很是欣慰,特地拟了一个很好的评语”(见该书第四分《补树书屋旧事》第十二则《办公事》);而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年)中则说,鲁迅将该书“带回会馆来,同我会拟了一条称赞的评语”(见该书《鲁迅与清末文坛》篇)。《鲁迅全集》在编辑时根据前文将此篇归入鲁迅名下,却丝毫不提后文,恐怕有些欠妥。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问世后风行一时,对安徒生的

大力推介自然会引发读者的好奇。没过多久,陈家麟、陈大镫合译的安徒生童话集《十之九》(中华书局,1918 年)就应运而生,选译的六篇中恰有《国王之新服》,这也是这则童话的首个完整汉译本。两位译者与中华屡有合作,因而出版方在宣传时不遗余力,在《本局出版各种小说提要》(解筱《小说话》附录,中华书局,1919 年。从题名看,《提要》应是中华书局所拟,今人多误以为解氏手笔)中,除了概述全书内容外,还提醒读者留意,“其最奇之两篇”,一为《牧童》,“一为《国王奇服》,国王既好奇服,有二织工献织无形之衣,衣惟忠智者见之。